

内田康哉出任满铁总裁

廖 远

(一)

20世纪20年代末，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经济危机，中日关系自日本人炸死东北军阀头目张作霖之后更日趋恶化，在中国东北经营20余年的满铁也陷入了困境，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了是采取政治手段或军事手段来解决“满蒙问题”的两种不同的外交方针。在这种情况下，属于政友会系统的外交界元老和政界名人，曾历任驻华公使，驻澳、瑞、美、俄大使、四届内阁外相、枢密院顾问官、贵族院议员的内田康哉，以70岁的高龄担任了满铁第11任总裁。

内田康哉是经日本内阁首相若槻礼次郎根据元老西园寺公望的希望和外相币原喜重郎的推荐，于1931年6月13日任命为满铁总裁的。日本政府所以选中这样一个资深望众的人物充任满铁总裁，其着眼点并不在于满铁本身的经营，而在于推行日本的“满蒙政策”，以期借助内田康哉的资历与声望，统一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政治和外交，即解决日本在东北的“四头政治”（指关东厅、关东军、满铁与总领事馆四个机关各自为政，各行其事）和“双重外交”（指外务系统的外交和军部系统的外交），进而统一日本侵略势力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步骤。因此，内田康哉就任满铁总裁，曾引起了日本各界的重视和朝野的一致欢迎。在内田来中国东北赴任之前，日本陆军大臣南次郎曾邀

请新上任的朝鲜总督宇垣一成等人与内田康哉及同时上任的副总裁江口定条会见，以期加强军部与满铁的联系，并协调对朝鲜和中国东北的侵略政策。而内田康哉本身也发表谈话说：余于中国，关系颇深，于尽力此后之中日亲善，或不无方便。”^①

(二)

1931年7月5日，内田康哉启程赴中国东北，当时正值日警于7月1日制造万宝山伤害中国农民事件，并借机造谣，污蔑中国农民杀害韩农，于7月初旬在朝鲜各地掀起排华惨案，大批杀害中国侨民之际，同时，日本陆军省又制定了《解决满洲问题方案大纲》，内中规定“解决满蒙问题”“不得不采取军事行动”，“得以一年为期”^②。8月4日，陆相南次郎又在师团长会议上训示说：“满蒙问题只有用武力解决”^③。此外，日本一些团体，包括在中国东北的满洲青年联盟，也纷纷四处活动，鼓吹日本应以武力解决“满蒙问题”，建成日本人支配的“满蒙独立国”。在这种形势下，内田康哉则打出中日共存共荣和利益均分的招牌，以图巩固与扩大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权益和满铁的垄断地位。

8月16日，张学良派密使汤尔和赴日活动，途经大连时，曾访问了内田康哉，内田则施展其惯用的外交手腕，一面对汤尔和表示，他始终愿以和平、公正、稳妥的办法，确立日中之间友好协商的关系，目前正在煞费苦心地采取某些缓和政策，以避免引起意外冲突；一面又指派负责铁路交涉与运输事务的木村锐市劝诱汤尔和，让中方主动地提出建设“吉会”、“长大”两线的提案，以此表示诚意而换取日方一部分强硬过激论者的云

① 苏廉民：《满铁史》第425页，中华书局，1990年12月版。

② [日]《现代史资料7 满洲事变》第164页。

③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和日本》第8卷第235页。

消烟散。此后，内田又指使木村电请币原外相在会见汤尔和时，对由满铁建设吉会铁路给以鼎力援助。这是企图用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所造成的声势，对张学良施加压力，使之承允由满铁来修筑吉会铁路。

8月23日，内田康哉又到沈阳，与辽宁省长臧式毅，进行秘谈。内田向臧表示，满铁事务主要由副总裁江口定条处理，他自己决心从大局上为日中亲善献力。接着，内田又大谈日本当权者的难处，说币原外交现已被人诬为“软弱外交”、“卖国外交”，表示自己将要不顾这些毁誉论调，而为正义作出努力，必要时则要亲自出马。同时要求东北当局体谅日本执政者的困境，作出让步，尽速开始与日本进行铁路交涉。

此外，内田还按币原外相的指示，和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联系，打算邀请中国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来大连，由他们三人共同商拟解决“满洲问题”的基本方案。此事尚未成行，就爆发了关东军制造的“九·一八”事变。

(三)

对关东军制造“九·一八”事变，初时，老谋深算的内田康哉持观望态度。事变的前4天，他就得知将于18日夜发生军事行动的消息，为此，满铁的总务部次长山崎元千曾建议他去访问关东军参谋长，遭到了他的拒绝。柳条湖事件的当夜，满铁驻奉天的木村理事打电话给他，转达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的建议，为了限制事态扩大，希望内田总裁速向东京斡旋，他则以“不顶事”相拒绝，继续采取放任不管的态度。几天后，内田接到日本政府的“不扩大事态”的指令，则采取“对军方不协力，对事变不参与”的方针，仍留在大连继续观望。但在同时，对满铁在运输方面密切配合关东军，以及参加满洲青年

联盟和大雄峰会的一些满铁职员，应关东军之招请，积极参与侵占东北铁路、银行、电台、电厂、兵工厂等活动，也不加限制。

在“九·一八”事变十余天后，内田的态度开始变化。这时正值币原外相电令，内田总裁与江口副总裁速到东京汇报“满洲事变”之际，早与关东军参谋长商量好的满铁理事十河信二由沈阳赶至大连，劝说内田在回东京之前，先到沈阳和关东军首脑会谈。内田接受了十河理事的建议，于10月5日到达沈阳，逗留4天。在沈阳期间，他相继会见了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和参谋长三宅光治、参谋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人。会见时，本庄向内田讲述了制造伪满傀儡政权等问题。本庄说：要解决满蒙问题，除建立新政权外别无他途，如果只满足既得利益，只把眼光停留在南满地区，必将是后患无穷。接着本庄讲述了建立“新政权”的三条原则及其实质，即为：①使满蒙完全脱离中国本土；②使满蒙统一于一个政权；③表面上由中国人统治，但实质上由我方操纵之。而归根结底，这个新政权实质上必须置于我国的保护之下，至少要掌握军事、外交和交通的实权。同时，本庄还谈到，为建立“新政权”，要坚决反对日中谈判和撤兵，拒绝国联和美国的干涉，请内田不用担心。并请内田从日本当前大局出发，进京后帮助关东军与政府当权者充分交换意见。经过本庄的会谈和其他参谋的游说，内田廉哉接受了关东军的看法和恳请，决心甘当关东军的代言人去说服日本的决策者。同时，在逗留期间，他还拒绝了日本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的建议，林久治郎认为不能对军部放任不管，建议内田廉哉要求日本政府对发动事变的当事军官给予处分，以便使军部的行动回到正确轨道上来。内田廉哉则回答说：单靠一点处分，治不了军部；即使要进行处分，优柔寡断的现政府也办不到。

10月9日，内田离沈阳去东京，途经朝鲜京城时会见了朝鲜总督宇垣一成。两人意见一致，支持关东军在东北建立傀儡政权。回到日本后，内田康哉先后拜见与会见了元老西园寺公望、首相若槻礼次郎和外相币原喜重郎，以及其他政府成员和枢密院的一些官吏。相见时内田都以军方代表的姿态十分卖力地劝说有关人员，支持军队建立满蒙傀儡政权的计划。同时，他还拒绝了蒋介石的特使张公权提出的局部解决，请他向日本政府斡旋的要求。

与此同时，为了诱使与报答满铁的全面支持，关东军则把中国东北的交通及金融、工矿、森林、水田开发、羊毛改良、棉花栽培等经济部门，全都委托满铁把持与经营。

(四)

内田康哉态度转变后，即全面支持关东军的活动。他曾召集满铁在奉天办事处的全体职员开会，向他们宣布“满铁应竭尽全力去支援关东军”。这样，即使满铁与关东军实现了全面的合作，不仅在交通运输方面，而且在财政、金融等其他方面；满铁也派出大批人员，全力支持关东军的各项施策。他本身还积极活动，经他和军部一些人的努力，使日本政府同意贷给关东军机密费300万日元^①，从而解决了关东军侵略活动的经费不足。满铁派出的大批社员参加了关东军各部队，和关东军的人员一起，从事了政治策划、经济调查、统制宣传和搜集情报等工作，为夺取地方政权、统制金融、控制关税、劫夺海关、没收与恢复兵工厂、围剿抗日武装等立了汗马功劳。而满铁则对擅离职守的职员继续发放工资和旅差费，使之可以全力为关东

^① 苏崇民：《满铁史》第432页。

军服务。此后则有许多满铁社员成为关东军一些部门及伪满各级政权机构的官吏。据统计，从1931年9月到1933年3月，满铁共派出人员2600名。其中到关东军参谋部、副官部和特务部计212名（仅特务部即有161人），另有许多人员转任伪满政权的官吏，如1932年度，由满铁职员转为伪满官吏者计达244名。又如1932年4月，身居伪满政府机构要职的日系官吏共24名，而满铁出身者即占11名。可以说，满铁出身的人员是伪满机构日系官吏的主体。到1932年6月之前，在伪满国务院总务厅长官到次长、处长，以及伪国务院各部的总务司、各省的总务厅、司长的日系官吏中，满铁出身的占大部分，而这些满铁社员的大多数又是满洲青年联盟和大雄峰会的成员。

伪满傀儡政权建立后，关东军为加强对满铁的控制，通过陆军大臣积极活动。到1932年4月7日，拓务大臣为了迎和陆军，突然罢免了在财务上对陆军限制很严的江口定条的满铁副总裁职务，同时任命八田嘉明为副总裁。这一变动，使内田康哉很难接受，他当即提出辞职，后经总理大臣的挽留，留任了3个月。到当年7月6日，内田康哉辞去满铁总裁的职务，出任斋藤内阁的外务大臣。而新任的满铁总裁则是由陆军大臣荒木贞夫推荐的。

内田康哉出任日本政府外务大臣后，继续推行侵略中国东北，实行法西斯殖民统治的政策。他任外务大臣期间，日本于1932年9月15日承认了伪满政权，并于1933年3月28日退出国联。内田的外交被人们称为“焦土外交”。